

商品流通的“心脏”：民国时期的汉口堆栈业 (1912—1937)

井园园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汉口的堆栈业极为繁荣，并且已经成为具有多种职能的综合性服务行业。客商业务的需要以及汉口商业环境的变迁都促使客商对堆栈业产生强烈的依赖性，特别是在1927年以后，堆栈业与银行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客商资金周转的困难。堆栈业逐渐成为汉口商业运作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客商贩运货物到汉，均先将货物存入堆栈，遂形成了一种“客商—堆栈”模式。堆栈业在汉口商品流通和金融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的繁荣与否直接决定着一个商业中心城市辐射能力的强弱，因此“客商—堆栈”这一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对加强汉口与腹地的联系和扩大汉口商业圈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汉口 堆栈业 客商 商业

堆栈业^①是中国近代商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自一兴起就引起了时人的注意，当时报刊杂志上多载有堆栈业对于国民经济之重要性的文章，也有相关书籍出版，如：水野幸吉考察了汉口附设于轮船公司的仓库及中国固有的仓库的营业习惯，^②丁振一从学理角度全面分析了堆栈业的经济利益、主要业务、证券制度及各国的堆栈经营制度。^③而1949年以后学术界对这一行业的研究却极为薄弱，只是在城市史、贸易史或金融史的研究成果中有所涉及，对于汉口的堆栈业则更是缺乏关注。^④汉口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业型城市，对商品储存有极大的需求。民国时期汉口的堆栈业十分繁荣，并且已经发展为具有多种职能的综合性服务行业，其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客商贩运货物到汉均先存入堆栈，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因此汉口的客商与堆栈业的关系密不可分，相互依赖，呈现一种共生的状态，充分体现了堆栈业在汉口商业贸易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堆栈业的发展概况

潘君祥等指出，堆栈业是贸易发展、商业分工的一个结果。^⑤开埠以后，汉口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

【作者简介】 井园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23，邮箱：jingyy07@163.com。

① 堆栈业即仓储业，有的地方也叫货栈。1929年颁布的《民法》债篇内订有《仓库》一节，规定凡以受报酬而为他人堆藏及保管物品为业者，谓为仓库营业人，仓库遂成为法定名称，但是1937年前汉口一直俗称堆栈。

② [日]水野幸吉著，湖北嚶求学社译：《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上海昌明公司1908年版。

③ 丁振一：《堆栈业经营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④ 仇华飞的《历经沧桑的上海早期堆栈业》（《上海经济》1995年第4期）是笔者所见唯一一篇专门研究堆栈业的文章，作者从收入、工人的雇佣、栈单等方面简单介绍了上海早期堆栈业的发展情况。其他相关的研究则多在城市史中，从现代化视角论述堆栈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如皮明庠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贸易史的研究中，多概述堆栈业的业务，突出其在贸易中的重要性，如唐文起的《抗战前江苏粮食的流通》（《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田锡全的《长江三角洲的米粮贸易》（博士后工作报告，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以及李晓英的《天津洋行、货栈与近代西北羊毛贸易》（《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这些文章多将堆栈业作为贸易发展的原因来论述，对这一行业的运作及在贸易中如何发挥作用并无深入分析。

⑤ 潘君祥、陈立仪：《近代上海商业略论》，《史林》1989年第1期。

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开埠通商后势不可挡的商业力量,成为一个卓越的商业都会,由国内贸易中心迅速发展为国际贸易集散地,商圈不断扩大。汉口与其腹地之间的商品流通规模加大,速度加快,旧有的旅店和行栈附设的堆栈远远不能适应这样的变化,这就需要专业的组织来满足市场的需要,近代意义的堆栈业便应运而生。

1912年陆安、堃吉、资新堆栈最先成立,到1914年,汉口有堆栈11家,^①1918年汉水沿岸的堆栈开始兴盛起来,硚口开设的堆栈数量亦有增加。“彼时堆栈业务虽仍未能臻于十分发达之境地,然其在新兴时期,营业亦颇顺利。”^②汉阳与汉口在商业上有着密切关系,由于汉阳一带人口和水灾都较汉口为少,地价较低廉,因此汉阳成为汉口商业发展的大仓库。1926年汉口的堆栈增至25家(包括汉阳),分布于内河、外河与租界三处。^③

1927年,蒋介石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政策,造成了汉口的经济混乱,商业贸易受到巨大冲击,堆栈业也因此受到影响。商人寄存货物的数量减少,又因交易不成,堆期延长或拖欠栈租,堆栈业蒙受了极大损失。为谋其生存发展,堆栈商开始与银行建立往来关系,向商人介绍押款以招揽生意。同时,各银行为发展押款、押汇业务,自设堆栈之风逐渐盛行,如上海银行开设了汉口第一栈至第七栈,聚兴诚银行设立二栈和三栈等。1930年汉口市堆栈业同业公会成立,通过了同业公会章程,有力地推动了堆栈业的发展。1931年汉口的堆栈计有42家,并发展成为以商品种类划分的专业性堆栈:其中以堆杂粮为大宗之堆栈数量最多,有中国第二栈、通孚合栈等11家;以堆存棉花为大宗之堆栈次之,有盛星堆栈、星记堆栈等9家;以油类为大宗之堆栈有信德等3家;其余分别以纸张、苧麻、莲子及各种杂类产品为大宗之堆栈分别有一二家。^④

由于汉口区域间贸易及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以土产品为大宗,这就决定了汉口堆栈业以堆存土特产为主要业务的特色。由1931年专业性堆栈之类别也可看出粮食堆栈和棉花堆栈之盛行。根据1937年武汉堆栈行业户表的统计,48家堆栈中有42家以堆存棉花、粮食、纸等为主要业务,只有1家堆存五金,6家堆存杂货。^⑤

1931年武汉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商业贸易几乎陷于停顿,堆栈业为本身营业计,更加注重发展与银行的关系。由于堆栈多位于汉阳江边与汉口特别区及硚口一带,无不被水淹没,因此损失不赀,尤其是淮盐一项。如通孚合记堆栈在水灾中竭力抢救,“前后搬出之货约计十分之七有奇,被水淹没之货十分之三而不足。其间以按户核计则各不等,自十分之一以下至十分之九以上者,或全数搬出,甚至全数淹没者有之。”^⑥遇此天灾,虽然堆栈不负赔偿责任,但商号营业的停滞必然影响到堆栈营业,灾后“工商业情形,仅有灾前十分之三四”,^⑦不少堆栈关门倒闭,仅剩下28家继续营业。

根据1932年汉口市堆栈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的记载,加入同业公会的有17家。堆栈业的规模大小不等,而且差距较大,最大的一家为星记堆栈,有店员17人,通孚堆栈有11人,而规模小的堆栈店员仅有2人。经营此业的大多为湖北本地人,以汉阳和沔阳人为最多。^⑧堆栈多位于交通十分便利的地方,分布相当集中,硚口铁路边、大水巷、宝庆一街等地是堆栈业的聚集区,这些地方成为汉口新的“心脏”。

① 徐焕斗:《汉口小志·商业志》,汉口:爱国图书公司1915年版,第19页。

② 《武汉之工商业(一)》,《汉口商业月刊》第1卷第11期(1934年)。

③ 汉口商业一览编辑处编:《汉口商业一览》,1926年印刷,张妍、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66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317页。设于汉阳及汉口华界者,为内河;设于汉阳南岸嘴一带者,为外河。

④ 《武汉之工商业(一)》,《汉口商业月刊》第1卷第11期(1934年)。

⑤ 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商业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45—747页。

⑥ 《汉口通孚合记堆栈报告书——灾情经过报告书》(1931年,具体时间不详),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5—702。

⑦ 《武汉之工商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2年编印,第26页。

⑧ 《汉口市堆栈业同业公会第一次改选会员名册》(1932年9月4日),武汉市档案馆藏,档号bf25/233。

1934年天气亢旱,各地农产物产量大大减少,堆栈营业也受到连带影响。虽然全年营业总额变化不大,但是各项开支日益增高,各家均感不敷应付,27家堆栈中,歇业2家,仅3家赢利,亏折7家。^①受政治形势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堆栈业虽然历经曲折,但是之后逐渐恢复,呈现出繁荣景象。中国银行在硚口购地建筑大规模现代式仓库,湖北省银行在汉正街清远巷新建仓库,扩充营业。

1937年堆栈业同业公会的会员达到25家,很多堆栈的营业规模有所扩大,如星记堆栈店员人数增加到了21人,通孚堆栈店员增加到了13人。^②到抗战前夕,汉口的堆栈业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达到了顶峰时期,高大的堆栈建筑林立,成为汉口商业发展的纪念碑。抗战前夕云集武汉的外国记者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安娜在游记中写道,“现代化的大厦与银行,巨大的仓库,那些有美丽花园的别墅和高级旅馆,都是汉口有代表性的建筑物”。^③

二、客商的经营及对堆栈的依赖性

客商^④是汉口城市商业生活的一大特色,“全国之商人日相往来,游行如织”,^⑤“各省商贾无不由本店或支店设立于其间”。^⑥汉口的商业是掌握在客商手中的,市场上虽然也有本地土著商人,然“其实使汉口为中国之大镇,日益趋于繁盛者,乃各处商人为之也”。汉口的客商按照地域划分汇聚成商帮,在汉口从事贸易的商帮主要有湖北帮、湖南帮、宁波帮、四川帮、广东帮、江西帮、陕西及山西帮、祥帮、徽州帮等。^⑦

客商的商贸活动在汉口市场上占据着支配地位,汉口各大宗货物基本上都是由客帮贩运至汉集散。民国初年,汉口各客帮的年贸易额分别为:宁波帮(含南京)与广东帮(含香港)相埒,约3500—4000万两;稍次者为湖南帮,约2600万—3000万两;四川帮与河南帮堪为伯仲,均在1400万—1600万两之间;江西、福建、云贵、天津各帮均约1000万两;山陕帮和山东帮相似,同为700万—800万两;最次为徽州帮,约600万—700万两。^⑧1920年以后,汉口对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棉花、茶叶、桐油、山货等,因此客商的经营也集中于这几个行业。1930年在汉口经营棉花出口的商家中申帮有55家,黄帮(黄州商人)有28家。作为重要的茶叶贸易口岸,汉口经营内销和外销中介的茶栈(行)就有100余家,其中有湖南帮、湖北帮、广东帮、江西帮、江南帮、山西帮等,以湖南帮势力最为雄厚。汉口山货行业汇聚客商最多,其中药材行有30余家,药材号主要为江西、四川、山陕、广东、浙江商人开设。^⑨

怡和、太古、日清等洋行多自设堆栈存放进口洋货和收购的土货,与这些实力雄厚且常年驻汉的洋行不同,客商一般采取“客寓式”经营方式。根据罗威廉的研究,客商多短期寄居于会馆、旅店及行栈内,有些大商人则在汉口建立季节性的居家。^⑩到了民国时期,客商则多在汉口设立分号或坐庄,或委托当地行栈商代为购销。对于客商来说,如自设堆栈,地租、房屋建筑费、修理费等各种费用都是一项不菲的支出,并且土货等商品的交易大都为季节性的,因此几乎没有客商自设堆栈。

民国时期,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进出口中心,货物流转速度较快,形成了以“便于货物转运之船

① 邹宗伊:《二十三年度汉市百业盈亏调查》,《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8期(1935年)。

② 《汉口市堆栈业同业公会第三次改选会员名册》(1937年5月23日),武汉市档案馆藏,档号 h25/233。

③ 皮明麻、吴勇主编:《汉口五百年》,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④ 本文所说的客商是与汉口土著商人相对而言的外地商人,湖北帮中汉口土著人较少,因此湖北帮也列于客商范围之内。

⑤ 两湖督署:《中国经济全书》第2辑,光绪戊申年(1908)刊本,第72页。

⑥ 侯祖畬、吕寅东修:《夏口县志》卷12《商务志》,民国九年(1920)铅印本,第10页。

⑦ 参见两湖督署《中国经济全书》第2辑,第72—76页。

⑧ 侯祖畬、吕寅东修:《夏口县志》卷12《商务志》,第11—12页。

⑨ 《武汉之工商业》,第100—103、121—123、163页。

⑩ [美]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272页。

只停靠及货物上下”为目的的码头堆栈为特色的堆栈业，“其保管货物反视为较轻”。^①汉口则对货物保管的需要更为迫切。客商贩运货物到汉后，并非即到即罄，商品行情瞬息变化，如市价的起跌，购买力的强弱，都可能使得交易无法达成。即便货物能于短时间内脱售，但由于汉口商业习惯格外复杂，交易手续纷繁，货物成交之前也须耗去相当时间。货物囤积之安全，成为客商所萦怀之主要问题。^②因此，货物之存储为汉口客商所必需的一种营业。堆栈业兴起之前，汉口最重要的储存货物的地方为行栈和客栈附设的栈房。民国时期，一方面行栈和客栈附设栈房的储存规模不能满足大量货物集中的需求，另一方面行栈和客栈保管货物并不规范，存有很多漏洞。比如存于行栈的货物都由管行师傅清理保管，而管行师傅常常利用工作之便，暗中窃取货物，而“所有损失都是由货主自行负责，行方以售出的数量为准”。^③而与此相反，堆栈业以专门保管货物为业，堆栈对货物数量、品质、进出都有详细的记载，不仅有货物保管技术上之专长，对于货物之装卸等各种附带手续，都较为严格。货物成交之后，买卖双方及堆栈业主共同验明栈单及货品，保证了客商货物的安全。此外，根据民国时期的商业习惯，客商到货，一般都经过行栈达成交易。如果商人将货物存入堆栈，则有充分的时间选择行栈商，因此就获得了销售货物的自主权。否则交易只能由行栈左右，尽受行栈刻意压低商品价格之苦。

同时，汉口的堆栈业在民国年间已经成为具有多种业务的综合性服务行业，为客商经营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是整理加工货物。如果货物堆放时间较长，堆栈可提供风场、缝补包装、出晒等服务。如农产品之收藏，因恐潮湿损坏而加以烘晒，或恐鲜鱼肉类日久腐坏，而加以腌制等。二是代理搬运。客商只需向堆栈商付力资，堆栈商即可代客商雇佣码头工人搬运货物。三是转运货物。汉口的很多堆栈都兼营转运业务，如大同、元顺、新顺堆栈等，负责货物一切运输事宜，并可降低货物运输成本。此外，堆栈业也提供代理买卖，代收货款，代理报关，供给商人各地运费及商业行情等服务。

1927年以后，汉口的商业环境不够稳定，商业的发展面临着各种障碍，其中运转资金的问题是影响客商的关键因素。1927年的政治冲突导致汉口市场交易疲滞，金融周转不灵。客商货物因交易困难而滞留于堆栈，不仅不能以之生利，反致资金积压，还需支付栈租等各种花费，因此客商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日益迫切。而向来作为商人资金来源的钱庄，此时却因武汉政府“集中现金”的举措遭受到致命打击，“一百八十余家之钱庄，竟在一二年间几乎全部倒闭”。^④到1928年，虽然数量有所恢复，但资金都比较薄弱，营业范围也大为缩小，大都不再做存放款业务。银行业虽在1927年也受到打击，但在1928年，“银行更形发展，加添有十余家”。^⑤在此经济恐慌之际，银行为稳妥起见，多偏重于抵押放款。“银行依堆栈谋所拥资财之出路，堆栈为招徕生意计亦必借重于银行之声势”，1927年汉口通孚堆栈首开介绍银行放款于客商之先例，其他堆栈遂起而效尤。1931年武汉遭受严重水灾，接着1934年江浙、两湖、赣皖、鲁豫、直陕、晋等11省因为受到旱灾，农村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依赖农产品出口的汉口贸易日趋衰落。“贩运货物之客商，几有非赖银行之现金即不能营业之势”，^⑥多数客商将货物存入堆栈即是为了得到押款。堆栈商遂相继与银行签订合同，代银行承做押款。“堆栈栈单抵押放款为银行最稳妥之投资”，^⑦堆栈业作为专门保管货物之机构，对于保管品之评价等方面的业务都比较精通，代办押款对银行而言大有裨益。到1934年，汉口各主要堆栈都与银行建立了合约关系。凡寄存在堆栈的货物，如商人想做押款，堆栈商向与之签约的银行介绍承做，而堆栈在商人的

① 《上海堆栈业之调查》，《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9—12期（1929年）。

② 《武汉之工商业（一）》，《汉口商业月刊》第1卷第11期（1934年）。

③ 刘克绳：《武汉地区的中药材行业》，《武汉文史资料》1981年第5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第161页。

④ 《武汉之工商业调查（三）》，《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1期（1935年）。

⑤ 《湖北省年鉴》第1回（内刊），湖北省秘书处统计室1937年编印，第418页。

⑥ 《武汉之工商业（一）》，《汉口商业月刊》第1卷第11期（1934年）。

⑦ 郑维均：《说银行堆栈之簿记（一）》，《银行周报》第6卷第48号（1922年12月12日）。

信用上对银行负责,对于押货负完全保管的责任,并从中抽取一定的佣金。堆栈承做押款之业务,对于客商来说无异于如鱼得水。因此资金融通之便利,成为了处于困顿之中的客商与堆栈业之间的粘合剂。

因此,客商业务的需要及汉口商业环境的恶化都促使客商表现出对堆栈强烈的依赖性。汉口各主要输入输出商品到汉均先入堆栈,“棉花运抵汉口后大都堆存于堆栈中,以待善价而估”。^①“茶叶运至汉口未脱售之前,须入堆栈贮藏”。^②“小麦到达汉口以后,或就地销售,或转运上海,均奉半先入堆栈”,“栈内掣发栈单,该单即系代表保管货物之证据,可持向银钱业押款。汉口粮商均恃为周转之需”。^③“桐油由各产地运汉以后,大多即存油栈,故汉口油栈甚多”,“存栈以后,即由油商与出口商谈盘论价”。^④可见客货存栈或为商品未能脱售,或为待价而沽,或为获得资金周转之便等各种原因。客商到汉后即把货物存入堆栈便逐渐成为了一种固定的“客商一堆栈”模式。

三、“客商一堆栈”运作模式

“客商一堆栈”模式是在汉口动荡的商业环境的影响下,商品流通和市场分工相互作用逐渐形成的,体现着二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其成为汉口与腹地间商品流通的固定模式,不仅在于客商对堆栈业的单方依赖,也在于栈单制度促成的共赢和双方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 栈单的作用

客商将货物寄存于堆栈时,由堆栈发给栈单。^⑤栈单实际为一种有价证券和流通证券,可作抵押和转让之用。资金紧迫的商人可持栈单向银行押款,栈单押款使货物随时具有资金化的性能,解决了客商无运转资金的后顾之忧。栈单押款较现物抵押可以省去很多繁琐的手续,“普通银行业者,对于信用素著之栈单,常认为良善之押品”。^⑥特别是在1927年以后,栈单押款成为客商获取流动资金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另一方面栈单作为货物所有权的凭证,客商进行交易时可以直接以栈单相授受,无须现物之交割。根据汉口的交易习惯,货物交付时,一般由卖主送到买主指定的场所,如果指定为堆栈,则运送费归买主担任。如果仅以栈单进行交割,对于买主和卖主来说简化了交易手续,节省了很多成本。因此在汉口的市场交易中,利用栈单直接交易成为各个行业普遍采用的交易方式。如茶叶贸易中,“1916年汪同元等茶行堆存外销箱红、花香很多,还有部分存于汉阳昌记栈。由于外销呆滞,各行存茶甚多,有少数卖给囤户,只交栈单,价仅60%。”^⑦再如棉花交易,棉花运抵汉口,大多储存堆栈以待顾客,“棉花贸易手续向无一定标准,大致多由行家向卖客提取货样代为兜售,如合意者则至货栈勘验实货,磋议价格,然后双方订立买卖单据,由卖客移交栈单,以为成交手续。”^⑧这种交易方式,对于堆栈而言,虽然货物易主,而堆栈则始终是该货物存放地。栈单的这两大功能,不仅是堆栈招揽客商的办法,也成为客商将货物存放堆栈的主要目的。栈单成为了加强双方联系的重要媒介。

① 《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2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编印,第118页。

② 《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第5页。

③ 《汉口之粉麦市场》,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汇编》第2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243页。

④ 《武汉之工商业》,第117页。

⑤ 由于民国时期我国并未制定堆栈法规,堆栈商完全根据当地的商事习惯发行栈单。所以我国所谓的栈单,意义并不明了。汉口的堆栈发行的存货单据种类很多,但单据上所记载的内容大致相同,包括寄托人姓名、住址、保管场所、受寄托物之种类、品质数量、保管费等,并由堆栈营业人签名。

⑥ 李恭楷:《堆栈业概说(上)》,《银行周报》第6卷第27号(1922年7月18日)。

⑦ 程静安:《旧武汉茶业的回忆》,《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1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年编印,第134页。

⑧ 《汉口棉业之调查》,《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29年)。

(二) 客商与堆栈的良性互动

客商与堆栈之间的良性互动主要体现在业务往来上,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资金问题上。堆栈不仅向客商介绍押款,而且为联络感情起见,还向与该堆栈有堆货关系之客商信用放款。不少客商与堆栈有多年往来关系,相互注重信用。客商押款如仍不敷使用或者货物在途急需用款,客商一般凭书信或电报及码单向堆栈申请通融款项。腹地客帮与特定堆栈一般有固定联系,如随州花帮贩运棉花抵汉,向来存上海银行所附属的汉口各堆栈。“随州花帮偶逢比期,有时货到岸,指令来货作抵,商借小数额款项应兑上票,候货到岸进栈后做妥押款,即行抵还”,“该帮来货向存我栈,独家进出,不可不予例外通融,以联络感情”。^① 银行为保证放款安全,对信用放款格外审慎,曾多次禁止所附属之堆栈承做。但是由于竞争激烈,停止承做信用放款业务并不能真正实行。上海银行汉口堆栈总办事处以代做十足押款为招揽客商之方法,但实际上海银行仍照八成承做,其余二成,则是堆栈负责出资贷给客商。1927年以后随着堆栈押款风起,“堆栈已自置栈基向银行押用款项而转放者有之,或核实客号之存款而代放者亦有之”。^② 堆栈向银行申请信用透支有时会遭到银行的拒绝,因此很多堆栈自设栈基向银行抵押款项转放与客户。如盛星堆栈自行向中国农工银行抵押亚细亚火油以得到款项。除了银行,堆栈放款的另一重要资金来源即为客商。很多客商为了谋取利益,将多余资金存于堆栈,让堆栈商代为转放。如1931年通孚合记堆栈各户的存款有21 263.96元,另外尚有客商的暂时存款2 753.25元,^③暂时存款为客商提前支付给堆栈的货物搬运所须的力资,可想而知,这部分资金也会被堆栈转用于放款。

表 1 盛星堆栈向农工银行借入款项及放与客户款项表 单位:元

时间	盛星堆栈向农工银行借入款项		放与客户(协记)款项
	栈单	金额	金额
1934年9月15日	2 849	90 000	120 000
1934年9月20日	2 869	100 000	100 000
1934年9月27日	2 891	3 000 000	—
1934年10月15日	—	—	130 000
1934年10月16日	2 947	140 000	—
1934年10月17日	—	—	410 000
1934年10月31日	2 991	590 000	—

资料来源:《盛星堆栈向农工银行借入款项及放与客户款项分户表》(1934年),武汉市档案馆藏,档号172—1—348。

马俊亚曾注意到无锡传统丝茧堆栈、粮食堆栈的存放款业务及栈单押款业务,并指出其对新式工业的资金挹注作用。^④ 由表1可以看出,存放款业务已经成为汉口堆栈业务中最活跃的一部分,这种资金融通的功能对于商业扩展具有重要意义。“自银行风行货物抵押借款之后,棉花杂粮之囤积于堆栈者,什九贪做押款”,^⑤堆栈业则不断扩大存放款业务以满足商人资金周转及扩充投资的需求,几乎成了银行的“延伸机构”。堆栈商放与客户的款项不仅来自于自行抵押借款和客商的存款,我们还可以推测,其另一来源为堆栈商利用客货进行抵押所得的资金。因此以堆栈为连接点,以资金为纽带,不仅架起了客商之间的联系,也使得堆栈与客商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固。这种建立于相互信任和依赖基础上的良性合作关系,一方面保证了堆栈流动资金的来源,另一方面也为商业发展积聚了

① 《上海银行第17号函》(1932年9月27日),武汉市档案馆藏,档号61—1—611。

② 《汉口堆栈总办事处来函》(1930年12月29日),武汉市档案馆藏,档号61—1—147。

③ 《汉口通孚合记堆栈报告书——收支对照表》(1931年9月3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5—702。

④ 马俊亚:《近代无锡传统经济部门的运营与新式工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⑤ 《汉口堆栈业调查记》,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编:《豫鄂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下,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626页。

后备资本，增强了客商的资金运转能力。

客商如与堆栈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获得栈租、力资等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客商乐于向堆栈推荐工作人员，而堆栈为招徕客商生意，也会重用商号推荐的人员。商号推荐人员在汉口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如恒丰升花号向汉口堆栈介绍久任花行生意的刘继宗，“当即派赴七栈充任营业员，月薪洋四十元”；王礼记花号介绍的王逢春，被派往汉口第七栈担任账务工作；万和花号介绍的凌运保，被派赴汉口第七栈任补包员；慎德花号介绍的李锦卿，虽无工作经验，亦被派赴汉口第六栈做练习生。^①

1932年10月，汉口堆栈各分栈为发展业务，拟扩大职员规模，总办事处令“客帮中能有大宗生意，其所推荐之营业员，势须留用，以图发展”。一般情况下堆栈职员如有缺额，由业绩良好之练习生补充，如有商号推荐人员，堆栈自然会适当引用。1933年10月，汉口各堆栈“因前次业已提升三人，而堆花较多之客号纷纷推荐员生，目下需人帮忙，正好酌量引用藉以联络感情，扩充收入”。利用商号推荐人员的关系网是堆栈扩充生意最便捷的途径。“六栈新进黄帮营业员程君敬钊，该员系鼎盛信号东之子，在该帮中颇有信仰，该帮所办河口、樊城之花每年为数颇巨，该员可以广为招进，每月薪水30元。”^②因此，堆栈重用商号推荐人员，对双方来说是一件共赢的事情。

一旦与客商建立起往来关系，堆栈则十分注重维持客户来源。附属上海银行的汉阳三栈自移交湖北省银行后，由于“杂货客家业已联络，熟习往来，生意尚多，似觉弃之可惜”，^③所以另筹一杂货栈继续接办。维持客户的常用方式则是与客商建立私人友好关系，堆栈商每年都要为此花费相当的交际费。每年棉花、粮食等货物上市后，堆栈的交际费用随即增加，宴请客商是堆栈招徕生意的重要途径。如遇到客商的婚丧喜庆等事，堆栈商会借此机会向客商送礼。建立私人关系，堆栈不仅可以稳定存货客户，也可以减少双方的交易成本。

四、堆栈业在汉口商业发展中的作用

“客商一堆栈”模式的固定，充分说明了堆栈业是汉口商业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堆栈为商人提供货物保管、加工分类、搬运、转运、代理报关等等服务，为商人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经济成本，促进了商品的流通。“经营堆栈者，因其经验丰富，已成为办理货物运输之专家，故关于符号之记载、转运及处理等费用，自较货商亲身料理为省”。^④堆栈业代银行承做押款业务，通过介绍押款使金融业广泛进入到商品流通的资金链中，从而促进了资金融通，对缓解汉口商业疲滞起了重要作用。这使得资金紧迫的商人不至于在货价下跌时贱价卖出，徒遭损失，“但资本并不因之而束缚，商业并不因之而停滞。助金融之流转，免经济之恐慌，堆栈业与有力焉”。^⑤同时货物押款也是商人扩张投资的一个重要途径。可见堆栈业在商品流通及金融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堆栈业在汉口城市经济中的重要性，带动了以堆栈为中心的集市区的形成和扩张。交易达成之前，从事居间介绍的行栈商一般问清客商货物数量和所存堆栈位置，去堆栈查看货物之后方能议定价格及交易条件。行栈商为了方便生意起见，往往将行址设在堆栈附近，茶馆等一些休闲机构也相继设立，随之客商云集于此，这便形成了以堆栈为中心的繁华的集市区。汉口的粮食行均靠近堆栈，沿汉水以北的河街，是粮食行和堆栈最密集的地方。“火车行（笔者按：粮食行的一种称呼）即在桥口外与转运堆栈接近，专卖火车上运来之杂粮。”^⑥川丝行“分布在汉口大夹街一带，接

① 《汉口堆栈总办事处函》（1930年5月9日），武汉市档案馆藏，档号61—1—147。

② 《汉口堆栈总办事处函》（1933年10月某日，1933年10月14日，1934年3月14日），武汉市档案馆藏，档号61—1—162。

③ 《汉口堆栈总办事处函》（1930年6月30日），武汉市档案馆藏，档号61—1—147。

④ 邱正伦：《堆栈对于社会经济之贡献》，《中央银行月报》第3卷第10期（1934年）。

⑤ 张建新：《论堆栈之功用》，《钱业月报》第5卷第9期（1925年）。

⑥ 既明：《阳夏粮食行之习惯及其各部开设之行数》，《银行杂志》第1卷第16号（1924年6月16日）。

近襄河沿岸的堆栈”。^①棉花行最初多分布在大夹街、戏子街、万年街、黄陂街口、集家咀周围一代，因当时各地贩运来汉的棉花，均堆放于汉阳各堆栈，从集家咀过河方便。1920年以后，襄河（汉水过了襄阳以后，襄阳境内的下游，百姓称其为襄河）、府河的棉花大量运汉，超过外江来源，因此在汉口经营棉花的堆栈逐渐增多，棉花行的业务重点也改在汉口，因此棉花集市也就迁移到沿河一带，“一个是永宁巷河沿的凤山茶楼，楼上摆了20多张方桌，登楼眺望汉水河畔，每天有棉花买卖客商和棉花行经手人员云集于此，议商交易。另一个是邱家巷汉水街永丰堆栈对面的四海茶社，每天接待不少棉花客商和棉花行经手人员，棉花行的管行人员和工人都是在这里集中待调。”^②

此外，在维护汉口正常的商业秩序中，堆栈商及其同业公会可谓功不可没。汉口码头是一个纠纷多发之地，而且力资名目繁多，码头工人对来往客商极尽勒索之能，“蛮横无理，敲诈勒索为长江各埠之冠”。^③这严重阻碍了汉口商业的正常运行，“其影响所及，商旅视为畏途，经过货物，皆采取直航，不敢由汉转驳”。^④1933年汉口的猪鬃贸易衰落，根据时人的调查，“汉口运费昂贵，且码头工人习气嚣张，任意需索，故一部分之猪鬃不再装运汉口，而均直接运往上海。”^⑤这自然影响到了堆栈业的利益，因此尽量避免纠纷，减低力资，是堆栈商和客商的共同诉求。堆栈商一般遵循码头的习惯，利用头佬雇佣所在地段的码头工人，很少雇佣散工和长工，这无疑是减少工人纠纷及劳资纠纷最有效的方式。如交通银行堆栈和中国银行堆栈有两个专用码头，这两个码头由李风山和刘正大控制，他们统领着100多个码头工人，^⑥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堆栈便是他们固定的雇主。如果堆栈商没有遵循码头固守地段的习惯，那也是权衡利弊之后的一种选择。因此，如果发生纠纷，堆栈商有时会反对政府的调解意见或暗中支持一方之码头工人不接受调解结果。1935年沈家庙码头工人与宝庆码头工人互争谦和堆栈工作，汉口市政府做出调解：谦和堆栈工作应由沈家庙码头工人担任，原沈家庙工人分大生米厂工作三成让与宝庆码头工人独做。但是谦和堆栈却宣称“本栈客货船只均由湖南航来至本市宝庆码头停泊起货，工作如由沈家庙工人担任，宝庆码头工人自必不容，倘客人为避免纠纷将货物起存宝庆码头内之其他各栈，则本栈营业必受影响，且沈家庙工人连本栈以内之工作亦无有了，工商均有不利”，以此为理由呈请市政府变更决定。市政府重新召集双方工人查询商议，最后向谦和堆栈做了妥协。^⑦1931年下半年到1935年，码头工人与资方共发生纠纷29起，争执力资有18起，反对雇佣散工或长工的有8起。而其中码头工人与堆栈商发生的纠纷只有2起，一是1932年码头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一是1933年码头工人要求按照原定力资发给。^⑧堆栈商在减少码头工人勒索及降低力资中更是做了不懈努力。堆栈商常“利用工人争取工作而占许多便宜，不但本栈之货物上下不给工钱，而对于客人之货物上下亦往往扣取15%或25%工资。”^⑨堆栈业同业公会在争取降低力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多次与码头管理机构议定力资或呈请市政府解决劳资纠纷。如1935年码头工人搬运永孚堆栈和通孚堆栈的黄豆要求加价，双方发生争议，堆栈业同业公会向汉口市政府呈报，

① 朱和庭、胡筱轩：《解放前的汉口生丝出口贸易》，《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2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143页。

② 于福生：《汉口的棉花集市》，《武汉文史资料》1987年第2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第34页。

③ 程起陆：《昔日汉口的社会风气和陋规》，《武汉文史资料》1987年第1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第171页。

④ 汉口市商会第四次会员大会：蛋行业提案（1934年6月25日），武汉市档案馆藏，档号9—31—59。

⑤ 《汉口猪鬃业苧麻业之最近调查》，《汉口商业月刊》第1卷第10期（1934年）。

⑥ 周家灼：《工贸仓库六十年的变迁》，《武汉文史资料》1989年第4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第3页。

⑦ 《汉口市码头工人争议公断委员会为互争谦和堆栈码头工作一案裁决书》，《湖北省政府公报》第92期（1935年4月25日）。

⑧ 《湖北省年鉴》第1回（内刊），第769—775页。

⑨ 《利记转运公司工人张光彩呈控东方转运公司工人敖云发等侵占工作》（1946年8月22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6—2—739。

市政府令汉口市码头业务管理所查明制止,最后双方协议每包加钱二十文。^①在1936年汉口市商会第四次会员大会上,堆栈业同业公会向总商会提案,控诉了码头势力对汉口商业的恶劣影响,要求解决码头工人勒索力资的问题,“水陆码头工人垄断勒索视为牢不可破之专利,每遇客货到埠,多方挟制、刁难、交涉深感不易。在商方欲谋货物安全只能趋于威势,忍受重价,既后即多畏难裹足,或迳由出产地直运销达,长此以往势尽成束手”。^②堆栈商与码头势力的斡旋,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码头纠纷,维持了汉口商业环境的稳定。堆栈商力求降低力资及堆栈业同业公会多次请求固定力资的努力,直接保护了商人的实际利益,为汉口挽回了不必要的商业损失。

“堆栈业在社会经济之地位,固随工商业之发展而递进,而工商业之扩张,亦未始不赖堆栈之进步以增其可能性。”^③民国以来,汉口的国内外贸易迅速发展,其背后是堆栈业强大容量的支撑。作为全国重要的棉花市场和粮食市场,汉口的棉花和粮食贸易对堆栈业的需求尤为强烈,而堆栈业的规模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口的市场规模。汉口能够在国内市场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堆栈业的繁荣是一个重要条件。堆栈业的规模及资金融通的能力直接影响着汉口口岸与腹地之间的贸易规模,它的繁荣与否直接决定着一个商业中心城市辐射的强与弱,因此“客商—堆栈”这一模式的巩固与发展,对加强汉口与腹地的联系和扩大汉口商业圈具有重要意义。

The “Heart” of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The Warehousing Industry of Hankow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 – 1937)

Jing Yuanyuan

Abstract: Hankow’s ware-housing industry experienced a boom and became an integrated service industry with multiple func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raveling merchants’ business need and the changes of Hankow’s commerce environment increased the dependence of traveling merchants to the ware-housing industry. Especially after 1927, the cooperation with banks help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apital shortage. Thus, the ware-housing industry gradually became an irreplaceable part in Hankow’s commercial operation. When transported to Hankow, goods must be preserved in warehouses at first, which gradually became a fixed pattern—“Traveling merchants—warehouse” pattern. The warehousing industr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and finance in Hankow. A boom of ware-housing industry was a guarantee of the powerful radiant ability of a commercial center. Therefore,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veling merchants—warehouse” pattern was an important way to reinforce the links between Hankow and the hinterland and expand Hankow’s hinterland.

Key Words: Hankow; Warehousing Industry; Traveling Merchant; Commerce

(责任编辑:高超群)

① 《汉市府指令“忠字6309号”》,《湖北省政府公报》第124期(1935年8月15日)。

② 汉口市商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堆栈业提案(1934年6月25日),武汉市档案馆藏,档号9—31—59。

③ 张建新:《论堆栈之功用》,《钱业月报》第5卷第9期(1925年)。